

郑观应“商为国本”思想浅析

吴艳杰

(河北省政府 体制改革办公室,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要:“商为国本”思想是郑观应经济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他主张国家要重视商业,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工农业。其思想是以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为立足点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郑观应;经济思想;商为国本;重商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2001)01-0124-04

19世纪后半期,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体系里,出现了一种“重商”的经济思潮,这种思潮以对外贸易为立足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表达了类似西欧重商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其代表人物是郑观应。“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经济学说或经济政策。其主要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财富来源于顺差的贸易之中;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保护关税等。郑观应经济思想中,就或多或少地体现了重商主义的特点,如他的“商为国本”思想,保护关税思想,贸易差额论等都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其中最特色的就是他“商为国本”思想。本文就这一经济思想作一简要分析。

是“以商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或“重农抑商”,一直是19世纪后半期改良派和封建顽固派争论的中心。封建制度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以剥削农民的劳动而进行的农业生产是封建制度存在的基础,所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重视农业,对商业和手工业,则力图加以限制。封建顽固派认为“中国立国之本在安农,外国立国之本在利商,彼以利商安其民也。何以言之,中国户口繁盛,而地产所出止足以养欲给求,故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在重农抑商,不尽务山泽之利”。^[1]这种思想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了。

同西欧重商主义思想一样,郑观应把商业放在了国民经济的首位,提出了“商为国本”的观点。他认为:“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2]认为西方富强“首在通商”^[2]。基于中国贫弱的现状和对“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2]现象的对比,郑观应主张中国“欲图强必先致富;欲致富,首在兴商”^[3]。商业作为国民经济中

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离开其他部门而独立存在。郑观应在论述商业同农工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关系时,同样认为商的重要性在农工之上,并且提出了“富出于商”这样典型的重商思想。比如他在论述外国富强的原因时认为:“外国之强由于富,外国之富由于商,而商之盛则出于农工。”^[3]“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2]“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2]既然“富出于商”,那么“商败,而士、农、工俱败”^[2]。在这里,郑观应站在以商业为中心的角度看待商同工农之间的关系,把商业的重要性摆放在了工业、农业等生产部门之上,虽然没有像西欧重商主义思想家那样明确提出商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但他认为国富出于商,已经把商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郑观应重商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

既然“富出于商”“商为国本”,那么如何提高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呢?郑观应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一、要求国家重视商业,实行护商的经济政策

中国商业资本在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受到严重的压制,“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2]。郑观应在考察西方国家商业繁盛的原因时,认为“西人以商为战,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2],面对“外人之商业有政府以为后援,我国之政府对于我商人非惟不知保护,反多障碍”^[3]的对比,他要求政府也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真正重视商业,“商之宜重固如是矣,其重商之道……非国家重视焉不可也”^[2]。在此基础上,他主张“我朝廷亦宜设法保护商民”^[2],实行护商措施,例如裁去困商的厘金制度,在中央政府设立商部,在地方设商务

收稿日期: 1999-10-20

作者简介: 吴艳杰(1975-),女,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局,商人“凡有所求,力为保护”^[2];在教育方面,“设商学以教贸易”^[2]、“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2],培养商业人才,“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2]。

郑观应的这些重商主张和建议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和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普遍关注。这说明他的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不但冲击了封建政府一贯的“重农抑商”的国策,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并且对以后清王朝制定经济政策起了参考作用。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许多措施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都或多或少受到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思想的影响。

二、主张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

几千年来,传统的中国人讲究“知足安分”、“贵义贱利”,经商谋利为世人所不齿。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士居四民之首,商居其末”。封建习惯势力看不起商人,商人不为人所推重。这种现象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尖锐的冲突,影响着社会前进的步伐。郑观应对封建的“贱商”观念提出挑战:“古有四民,商居其末……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位!”^[2]因此他呼吁,填平横在“士”“商”之间的等级鸿沟,达到士商完全平等的社会现实,“一变隆古之习,视商如士”^[2]。并且明确表示“作商得财,人皆仰之;作官得财,人皆鄙之”^[2],也就是说,做生意赚钱比做官搜刮老百姓钱财要强得多。郑观应重视商人的思想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也危及到了封建主义王朝的统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郑观应的思想具有反封建传统的特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共同愿望,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从而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重视发展生产

郑观应虽然强调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但他从不忽视生产的重要性,只是这种对发展生产的肯定,仅仅是为了满足商业的需要。所以,郑观应在他重商的经济思想体系中,也提出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

(一)大力发展工业

既然工业服从于商业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在对外贸易中取得利润,就必须大力发展国内工业,以满足出口的需要。郑观应发展工业的主张,有其独到的见解。

首先,他要求发展中国的纺织工业。因为洋纱洋布的进口已经在中国外贸进口值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是造成中国入超的重要因素。“开关后40余年内,中国消费洋货之最大宗,首推鸦片,其次为棉制品,以发展趋势论,则以棉制品,特别是棉纱的增加最为神速。据估计,1842年,顷中国常年的输入物品约值25亿元,鸦片占55%,棉花占20%,棉制品居第三位,为8.4%;到1867年,全国进口总值69300000两中,棉制品占2%,在一切进口物品中已跃居第二位;到了1885年,进口净值88200000关两中,

棉制品以35.7%的优势压倒鸦片(28.8%)而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4]。郑观应也认识到中国“进口之货,除烟土外,以纱布为大宗,向时每岁进口值银一、二千万,光绪十八年增至五千二百七十三万七千四百余两,印度、英国棉纱值银二千二百三十余万两,迩来更有增无减,以致银钱外流”^[2]。在这里,郑观应从防止银钱外流的角度认识到了进口洋布、洋纱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特别是洋纱、洋布由于“价廉质美”,中国人竞相购买,造成“南省纱布之利半为所夺”^[2]的局面。因此,郑观应提出要发展中国近代纺织工业。他建议在“通商大埠及内地各省皆宜设纺织局,并购机织造,以塞来源”^[2]。以织助耕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也是中国封建统治的基础,由于洋纱洋布的涌入,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农民也日益卷入商品货币经济之中,以至“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2]。郑观应提出发展纺织工业,一方面是不愿让洋人夺华人之利,造成白银外流,主张自产自销。更为重要的是要“运售于元山及南洋各岛”^[2],发展国际贸易,“与泰西、日本诸国抗衡”^[2]。

其次,郑观应主张发展中国的机器工业。郑观应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大机器的引进和使用,它虽然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但郑观应从发展机器工业这一事业上看到了中国富强的希望。在谈到西方国家兴商务与机器制造业的关系时,他说“尝阅西书,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2]。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中国大量销售商品,根本原因在于机器生产工省价廉,有很大的竞争力。“泰西……无物不用机器,既事半功倍,亦省工而价廉,一切所制又复精巧绝伦,故能运之来,推行尽利,我国……苦于无机器,以致窳穷不精,难于销售”^[2]。针对这一情况,他主张“亟宜招商集款,购办机器,自行织造擅其利权”^[2]。在主张发展机器工业的同时,郑观应又提出了自造机器的主张:“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能自制造,则各种货物自能制造,所造之物即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外洋进口之货,皆人力之所为,而中国出口之货,多天生原质,以此相较,孰优孰绌,不待智者而知之。”^[2]另外,郑观应还认为自造机器能达到防止白银外流的目的,“器不向外购,尤能塞漏卮”^[3]。由此可见,郑观应主张自造机器,有利于生产出高质量、多品种、多数量的产品,同洋货争利,在对外贸易上能减少白银出口,有利于顺差的贸易往来。同时,还可以改变中国外贸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天生原质”,增添工业产品,从而改变中国外贸出生进熟的局面。

由以上论述可知,郑观应力求发展中国近代化工业,以适应对外贸易的要求。那么,在中国微弱的产业资本基

基础上,又如何加大产业资本的力量呢?这里就有一个产业资本如何而来的问题。在清政府所创办的洋务企业中,军事工业的建立大都由政府拨款而建,但以后民用工业的建立则多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即商人投资。与此同时,中国出现的为数很少、规模又很小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有不少是商人投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81家早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有50家是由商人投资建成的,占总数的61%左右^[5]。由此可见,在郑观应要求发展近代工业的时期,有一个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问题。在产业资本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阶段,比如说在西欧重商主义时代,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产业资本逐渐占上风,商业资本隶属于工业资本,重商主义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在郑观应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显然不可能走西欧的道路,这一方面是因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允许他们卵下的中国商业资本向着积极的进步的道路上走去,即向着产业资本转化,或对产业资本隶属的路上走去”^{[6](P338)}。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土地资本“三位一体”的特征,使得商业资本宁肯被用在高利贷和土地上去,而大用于产业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封建社会种种的传统法规及传统意识,妨碍生产活动,使他们权衡利害,更容易为当前的厚利和伴着厚利而可能取得的社会地位所吸引”^{[6](P331)}。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民族近代工业只能在外资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而不能达到郑观应所预期的以工助商,进而扭转中国贸易逆差的目的。

(二)发展商品性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根本的物质部门,农业不发展,商业的发展将会失去最稳固的基础。郑观应始终把农业放在与工业同等的地位。曾多次提出要“惠工恤农”^[3]、“课农惠工”^[3],把工、农看成是振兴商业的基础。他认为“农以生物,工以成物,若农工不振,商亦无所恃”^[3]、“商务旺,由于土产多,工艺盛,亟宜振兴农工以益民生而裕国库也”^[3]。可见,他也是从发展商业的角度来论述的,并特别提出了要发展中国的商品性农业。比如,他认为:“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以争印、日之权。”^[2]丝、茶是中国主要出口经济作物,由于外国出口量的增加,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受到冲击。以茶为例子,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内运输路线的缩短,出口茶价下降,尤其在1877年到1888年间,出口量虽有增长,但已受印度、锡兰、日本出口茶叶的影响,中国出口茶价更是猛跌,从事出口茶叶的华商也日益减少,以至于“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尔来反存十余家,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7]。茶价下降,虽然是外国茶叶竞争的结果,但洋行的垄断、重

重盘剥和内地税厘过重,都是茶叶贸易趋于没落的原因。以植桑养蚕为基础的生丝出口也由于外国同行业的竞争陷于衰落。郑观应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状况,“计其盛时,丝价值四千万两,今则减到三千七八百万两。茶价值三千五百余万两,今仅一千万两。既所得丝、茶全价,尚不能敌鸦片、洋布全数,况今日茶有印度、锡兰、日本之争,丝有意大利、法兰西、东洋之抵,衰竭可立待乎”^{[2]?}郑观应正是从对外贸易角度,主张“种茶树棉,养蚕缫丝”^[2],发展中国商品性农业和以工业原料为主的经济作物,达到抵制外国进口、塞漏卮的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外提供原料和由外输入工业品。中国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掠夺原料的结果,这在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的种类上最为典型。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农产品的出口占有首要地位。据《各年十二项主要出口货物所占出口总值的比重(1871—1947)》统计,在这十二项主要出口商品中,除去棉纱为机制品外,其他全为农产品或手工制品,如茶、丝、豆、豆饼、花生、棉花、桐油等。这些商品,在1871—1873年占出口贸易总值的87.5%,在1881—1883年占73%,到了甲午战前,这些商品也占有57.5%的份额^[8]。由于中国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原料的需要而引起,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也往往由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操纵其价格,造成这些作物生产的盛衰。如前面所提到的丝、茶的生产,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操纵,造成中国产品价格下跌,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郑观应提出要发展中国商品性农业,并非是为了迎合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出口廉价原材料,而是要在发展商品性农业的基础上,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抵制外国同类商品的进口。

除了发展丝、茶二业,郑观应还在他的《商战》篇中,提出了多种与外国“商战”的行业。比如,他主张在“南洋广蔗糖之植,中州开葡萄之园,酿酒制糖……加之制山东野蚕之丝茧,收江北土棉以纺,种植玫瑰等香花,制造香水洋胰等物”^[2]。在他的《农功》篇中,他还强调在“山谷闲地遍牧牛羊,取其毛以织呢绒,毡毯,东南边界则教以树棉,种桑,……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货愈多,销路自广”^[2]。面对外国洋纱洋布涌入中国,中国“土布失业”^[2]的局面,郑观应又提出“东南各省皆宜树棉,……棉花为编织所必需,除种土棉外,更须试种洋棉”^[2],因为洋棉“质软丝长,经机器不致中断”^[2]、“是为上品”^[2]。由此可见,郑观应主张发展商品性农业,广泛种植经济作物,是用以制成工业品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2]。农产品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农业近代化的一个特点,郑观应发展商品性农业的主张符合时代的要求。

郑观应提倡发展商品性农业无非是想从中国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着手,把农业同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同中国产业资本相结合,开拓中国的对外贸易,从而达到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目的。中国商业资本与农业本来就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中国产业资本的不发达,商业资本主要活动对象只能是农副产品或者说是土地生产物;再加上商业资本往往把聚积起来的资本重新投资于土地中去,使商业资本同土地资本牢固地结合起来。但这种商业资本同农业的密切联系,并非沿着郑观应所设想的积极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一种相反的状况,这是由中国商业资本的特点所决定的。其一,中国商业资本的保守性使其把自己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封建地主的剥削之上,这不但使商业资本不易向产业资本转化,也不易于向商业性农业资本转化,因而也就不利于商业活动开拓到对外贸易上去。其二,虽然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些商品性农业基地,比如丝、茶、棉花等经济作物基地,但这是由外国资本主义操纵的。中国商业资本的买办性使得它们依附于外国产业资本的需要,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中国买办性商业的存在和发展。这一切使得中国商品性农业的发展非但不能成为郑观应所设想的同外国进行贸易大战的物质基础,反而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中国创造了条件。所以说,中国商业资本虽然与农业有着深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大都建立在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基础上,无益于商业资本向外贸领域的大发

参考文献:

-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M],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252-253.
- [2] 郑观应.郑观应集[M](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3] 郑观应.郑观应集[M](下).
- [4]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M].科学出版社,1995.8-9.
- [5] 黄逸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展。这说明,郑观应发展商品性农业的主张和他发展外贸的目的相对来说缺少必要的社会条件,这虽然是中国商业资本的软弱性决定的,同时也是郑观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重商思想不成熟的体现。

综上所述,郑观应无论是大力提倡发展工业还是发展商品性农业,都是围绕对外贸易这个中心,都是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因此,他发展生产的主张和他“商为国本”思想是不矛盾的,他是在强调了“商为国本”的基础上才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必要性。不但是工业、农业,就连国家的军事、外交、教育等其他部门也均围绕“商”这个中心来布置,做到“公使为商遣,领事为商立,兵船为商置”。因此,郑观应发展生产的思想是他“商为国本”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重商经济思想的内容之一。

郑观应“商为国本”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商业资本较产业资本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列强势力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人以为外国的富强是由于贸易上的优势。郑观应的思想正是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概况,它是在多种因素和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形式的变化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使郑观应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是以工业的发达为后盾的,而不仅仅是商业的鼎盛。因此,他也逐步把“商为国本”思想转变到实业上来,明确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点。

22

- [6] 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M].人民出版社,1957.338-331.
- [7] 农学报.第29期,光绪三十四年闰三月.
- [8]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科学出版社,1958.76.

[责任编辑 赵志伟]

An analysis of Zheng Guanying's economic thinking

WU yan-jie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fice, Hebei Provincial Government,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bstract Taking commerce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o administer the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Zheng Guanying's economic thinking which embodies his mercantilism. He adhered that the stat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mmerce, raise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mercha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pay equal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thinking was to develop China's foreign trade, to boycott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capitalist commodity, which demonstrates a sense of time mission.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taking commerce as one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o administer the country; economic thinking